

# 民国初年呼伦贝尔地区国内移民探析

高乐才 汤风云

**[内容提要]** 呼伦贝尔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游牧民族生息繁衍的家园, 畜牧业经济占有优势地位, 被称为“久未开化”之地。民国初年, 华北人民因天灾人祸, 生活所迫, 部分灾民迁居地僻北疆的呼伦贝尔地区。移民改变了呼伦贝尔地区的人口结构和生产方式, 并为这一地区的经济繁荣和文化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 民国初年 呼伦贝尔地区 国内移民

呼伦贝尔地区在清中叶海拉尔建城后始有国内移民, 但为数很少, 只是经营商业和从事手工艺。直到民国初年, 吉林和黑龙江的华北移民才二次迁移进入呼伦贝尔地区, 开垦土地, 经营工商业。尽管呼伦贝尔地区的移民远不及东北其他地区移民那么壮观, 到 20 世纪 20 年代末也只有几万人, 但对呼伦贝尔地区经济、文化所产生的影响不可低估。

—

呼伦贝尔地区早在汉武帝太初三年(前 102), 汉使光禄徐自为征讨匈奴, “出五原塞数百里, 远者千里, 筑城障列亭至胘胸, 而使游击将军韩说, 长平侯卫伉屯其旁”<sup>①</sup>, 活动在今克鲁伦河附近。

呼伦贝尔地区区域概念的形成是清代以后, 雍正十二年(1734), 清政府在此设立卡伦 16 座, 道光二十七年(1847)又增设卡伦 3 座<sup>②</sup>。呼伦贝尔地区的地域范围: “东至内兴安岭 284 里, 与布特哈搭界; 西至察罕齐老山鄂博 436 里, 与喀尔喀搭界; 南至索岳尔济山 512 里, 与喀尔喀搭界; 北至额尔古纳河 300 里, 与俄罗斯国东悉毕尔部萨拜卡尔省搭界; 东北至伊克库克图山 920 里, 山北黑龙江界, 山东南墨尔根界; 西北至额尔古纳河 220 里, 俄罗斯界”<sup>③</sup>。

雍正十二年(1734), 清政府决定在伊敏河汇入海拉尔河的河口处建呼伦贝尔城(即今海拉尔城)。此后, 山西、北京一带的汉族商人, 河北、山东一带的手艺人陆续迁往呼伦贝尔地区。至此, 呼伦贝尔始有较稳定的汉族常住人口, 也是最早的关内移民。

鸦片战争以后, 沙俄再次侵犯我国北部边疆, 并割占我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沙俄并不以此为满足, 企图占领整个东北, 实现“远东政策”的“黄俄罗斯”计划。清政府为巩固边防, 遏制沙俄的南进, 增加国家税收, 解决财政困难, 自 19 世纪 60 年代开始, 鼓励关内向东北移民。但呼伦贝尔地区地处偏远, 又多为草原牧地, 关内汉族移民本不谙牧业, 多在黑龙江东部地区止步谋生。直到民国初年, 吉林和黑龙江的华北移民才二次迁移进入呼伦贝尔地区。

中东铁路修筑之后, 因交通的便利, 呼伦贝尔地区的移民才逐渐增多。特别是民国以后, 由于中原地区社会动荡和经济凋敝等原因, 人口大量北迁, 东北地区形成了空前未有的移民大潮。在众多的东北移民中, 一部分到达呼伦贝尔地区定居谋生。

呼伦贝尔地区的移民来源多为华北地区, 而山东、河北两省为最。其原因, 近代的中国进入民

**[作者简介]** 高乐才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教授 吉林 长春 130024  
汤风云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硕士研究生 吉林 长春 130024

国以后,军阀四起,为争夺地盘,穷兵黩武,战火连绵,华北地区最为激烈。直皖战争,两次直奉战争,蒋介石新军阀之间的战争,几无休止。“甲军朝行,乙军夕至;甚至一区域内,甲乙两军同时驻守”。整个华北“屡经兵燹”,军阀政权频繁更替。军阀所到之处,横行乡里,杀人越货,“哀我小民,一生九死”,“屋垣倾圮,无家可归者,更比比乎”<sup>④</sup>。在 1930 年的河南大战中,“因战事死亡人口达十二万余口,受伤人口一万九千五百余口,逃亡在外者达一百一十八万五千余口,被军队拉夫达一百二十九万七千七百余口,其中因以致死者三万余口,而兵士之死尚不在内,欧洲大战恐无此等情形也”。此次战争,“财产损失估洋四万八千五百三十三万余元,被毁房屋损失估值洋五十二万余元,被焚房屋估值洋三千八百一十五万余元,总计为六万五千一百四十六万九千余元,而间接及无形之损失尚不在内”<sup>⑤</sup>。

在战争蔓延的地区,散兵溃勇,不肖之徒,乘社会动荡之机,集聚为匪,鱼肉百姓,“格外猖獗,几乎弄成遍地皆匪的情势”<sup>⑥</sup>。他们大肆活动,危害百姓。而山东和河南匪患,比比皆是。山东有“鲁国多盗”之名,河南有“土匪王国”之称。可见土匪之泛滥成灾,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经济和人们的正常生活秩序。

此外,华北地区在历史上就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地区,民国时期更是天灾不断。据统计,仅 1920 年的河南、河北、山东等五省大旱中,“灾民二千万人,占全国五分之二,死亡五十万人,灾区三百十七县”<sup>⑦</sup>。被灾区域之广,灾民之众,历史空前。由于一家一户的自然经济,使广大农民毫无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同时国家贫穷,外债累累,无力救济灾民。社会救灾能力有限,更何况灾民遍地。

华北地区的人民在天灾人祸交替频发的年代里,为谋求生路,被逼无奈,只好背井离乡,渡海越关,前往毗邻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相对良好的东北地区谋生。据南开大学 1926 年对山东的调查,在 1149 户移入东北的农民中,其中因水、旱、蝗虫等灾害移入东北的有 164 人,占 14.3%。因战争匪患移入东北的有 150 人,占 13%<sup>⑧</sup>。

呼伦贝尔地区地僻北疆,人烟稀少,尚待开发。由于政府的移民垦殖优惠政策和呼伦贝尔地区的丰富资源,驱动和吸引了广大的华北人民到

此定居谋生。据有关资料统计,1910 年呼伦贝尔地区国内移民人口为 3907 人,占呼伦贝尔地区人口总数(26717 人)的 14.6%<sup>⑨</sup>,1922 年移民人口为 15468 人,占呼伦贝尔地区人口总数(70668 人)的 21.9%<sup>⑩</sup>,1927 年移民人口为 17177 人,占呼伦贝尔地区人口总数(72021 人)的 23.8%<sup>⑪</sup>。年平均移民人口数量达万余人,占呼伦贝尔人口比例的五分之一强。

根据上述呼伦贝尔地区关内年移民情况,如果我们取一移民中间数额的话,年移民应在万人左右,就一区域而言,年移民人口达万人,数量并不算少。如果按这以一中间值计算的话,从 1910 年至 1927 年的 18 年间,移民人口应在 18 万人左右。但实际上,到 1927 年呼伦贝尔地区的人口也只有 7 万余人。从 1910 年至 1927 年仅增长了 45304 人,除人口自然增长外,移民人口也只有 4 万人左右。其原因:一是原住民本为游牧民族,居无定处。民国时期盟与盟之间的界限并不十分明显,对牧民的放牧范围也没有严格的要求。而牧民游牧的选择是草原,而不仅仅局限于本区域,这就造成了人口的变化不定;二是移民中的大部分人由于生活所迫,暂时逃荒谋生,并没有长期定居他乡的打算,因此多数人春耕而来,秋实而归。根据调查资料显示,历年东北移民返回原籍者之数量多于留住者,只有少数特殊的年份是例外。如 1923 年,一种数据为,移入东北的人口总数为 434000 人,返回原籍的 287000 人,留居的仅有 147000 人,占总移入人口的 33.9%<sup>⑫</sup>。另一种数据为,移入东北的人口总数为 390000 人,返回原籍的 230000 人,留居的 160000 人,占总移入人口的 41%<sup>⑬</sup>。两者因引证的数据不同,因此所得出的百分比就不尽相同,但总体上差距不大。这一调查结果是以东北的总体状况进行分析所得出的比例数据,而地处偏远的呼伦贝尔地区的移民年留居的比值将会低于这个百分比;三是移民中的一部分人由于水土不服,气候不适应,生活不习惯,而迁居其他地区。再加上呼伦贝尔地处偏远,缺医少药,生活条件差,人口自然增长率不高。因此,呼伦贝尔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较缓慢。尽管如此,移民人口仍占有很大的比重,对呼伦贝尔地区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 二

移居呼伦贝尔地区的国内移民,大多来自山东、河北、河南、山西等省,主要是山东、河北两省。而来自山东的以登州、莱州和青州三府为最多。其原因是“交通之便,彼土之人,于受生计压迫之余,携其忍苦耐劳之精神,于东北新天地中大显身手”<sup>④</sup>。而迁居呼伦贝尔地区的河北人,“大部分是昌黎、滦县、乐亭、山海关边缘一带的人”<sup>⑤</sup>。

从迁居呼伦贝尔地区的国内移民职业结构上看,绝大多数从事农耕。位于额尔古纳河右岸的额右旗有大量的可耕地,而中东铁路沿线的满洲里、海拉尔又宜农宜商,因此国内移民多集中在中东铁路沿线和额尔古纳河右岸,从事农业的开发。据统计,到1927年,呼伦贝尔地区全境有耕地8260公顷<sup>⑥</sup>。这些耕地除一部分为俄国人越境偷垦外,大部分为国内移民所开垦。移民的土地开发,使呼伦贝尔在民国期间就已形成农牧结合的地区,改变了过去单一的牧业经济。

其次是商业。呼伦贝尔的商业主要集中在海拉尔和满洲里。海拉尔自清中叶建城以后,商业逐渐发展起来。到民国时期,因大批移民的到来,海拉尔便成为呼伦贝尔地区一重要商业中心。满洲里虽兴起较晚,但自开埠以后,发展迅速,商业日益兴盛。铁路的通车,人口的增加,推动了呼伦贝尔商业的发展。移民经商者山东人较多,其次是河北、山西移民。据日人守田利速调查统计,1913年海拉尔就有7家较有影响的国内移民所设立的商铺<sup>⑦</sup>。到20世纪20年代,随着移民高潮的到来,商业也得到了迅速发展,推动了呼伦贝尔地区经济的繁荣。

再次是矿业、林业、牧畜等行业。呼伦贝尔地区矿业、林业资源丰富,许多俄国资本家,不顾中国的禁令,私设林场,投资建矿,招雇大批中国关内移民,为其盗伐木材,偷采黄金。如俄商谢夫谦克1914年建立的扎免采木公司,到1922年其采伐范围已达兴安、伊列克得、乌奴尔及免渡河一带,占地面积1.7万平方公里<sup>⑧</sup>。又如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奇乾河金矿,到1914年,已年产金72832两<sup>⑨</sup>。场、矿规模之大,雇佣者之众,绝大多数为中国关内移民。

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移民靠从事季节性采集谋生。这种季节性采集在当地被称之为“三打”、

“三拣”。“三打”,在海拉尔谓打秧草、打旱獭子、打柞子。满洲里谓打鱼、打旱獭子、打秧草。“三拣”即拣羊毛、拣蘑菇、拣杂骨与山货。“三打”和“三拣”在当时的一部分移民中已逐渐成为常年从事的主业。这一行业的存在,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

移民人口的性别结构,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以1922年为例,呼伦贝尔全境国内移民总数为15468人,其中男性为13779人,占总人口的89.1%;女性为1689人,占总人口的10.9%<sup>⑩</sup>。究其原因,国内移民迁居呼伦贝尔者,大多数为短期行为。即或是打算定居东北者,但由于对东北的情况不甚了解,待工作和收入稳定后,再接家眷定居东北。因此,移民多半是孤身一人前往,不携带家眷。再者,俄国在此采矿、伐木,开办工厂所需大量的工人,多以单身男子为主。所以,诸多原因造成了民国时期呼伦贝尔地区人口男多女寡,比例失调。

移民的年龄构成,以青壮年为最多。民国初年呼伦贝尔地区国内移民年龄结构缺乏相关的统计资料,但据1935年大东公司对华北出关移民年龄构成的调查显示,出关移民未满20岁的占13.5%,20至30岁的占39.4%,30至40岁的占25.6%,40至50岁的占13.6%,50至60岁的占6.0%,60岁以上的占1.9%<sup>⑪</sup>。从以上的统计数字可以看出,在关内各省移往东北的移民中,50岁以下的青壮年劳力占移民总数的92.1%。由此可以推断,进入呼伦贝尔地区的国内移民的年龄结构当然也不例外。这些以青壮年为主的关内移民,他们不仅身强力壮,而且从事工农业的经验丰富,是开发、建设呼伦贝尔地区的主力军。

## 三

民国初年,随着移民的涌入,呼伦贝尔地区的土地开发进入了一个较快的发展时期,耕地面积明显增加。呼伦贝尔地区虽为草原牧地,但其中也有许多宜于农耕的土地。如海拉尔河以北珠尔干河以西,“土脉黑壤,沃野为多。虽微带沙性,而可事耕垦”<sup>⑫</sup>。关内移民到来之后,不仅改变了呼伦贝尔地区单一的牧业生产方式,而大量的可耕地得到了开发。

据统计,1924年呼伦贝尔地区耕种面积就已达到1606公顷,到1927年已增至8260公顷,4年间耕种面积增加了5倍。

1924—1926 年呼伦贝尔主要区域耕种面积 (单位:公顷)<sup>⑧</sup>

年代\地区	铁路沿线	额尔古纳河	三河地区	共计
1924	220	1320	66	1606
1925	330	2640	181	3151
1926	1138	4642	742	6522
1927	1650	5500	1110	8260

伴随着土地的开发,农作物的种植品种也不断增多。呼伦贝尔地区气候寒冷,无霜期较短,因此种植的品种多以生长期短的农作物为主,如小麦、裸麦、大麦、荞麦、铃铛麦等。以 1926 年为例,对呼伦贝尔主要区域所种植的品种、面积进行比较分析:

1926 年呼伦贝尔地区农作物种植种类 (单位:公顷)<sup>⑨</sup>

区域\种别	小麦	裸麦	铃铛麦	大麦	荞麦	麻	共计
铁路沿线一带	911	113	57	34		23	1138
占种植面积百分比	80	10	5	3		2	100
三河一带	409	149	59	37	74	14	742
占种植面积百分比	55	20	8	5	10	2	100
额尔古纳河一带	2211	885	530	442	310	44	4422
占种植面积百分比	50	20	12	10	7	1	100
乌罗夫河口	132	44	22	11	7	4	220
占种植面积百分比	60	20	10	5	3	2	100
共计	3663	1191	668	524	391	85	6522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各地种植多以小麦为主,占总种植面积的一半以上。中东铁路沿线地区,小麦的种植数量更高于其他地区,占该地区种植面积的 80%。

农作物种植面积的增加,主要是本地区人口增长对粮食的需求和中东铁路通车后商贸的发展。而小麦种植面积的扩大,一方面是由于移民人口主要是来自中国的华北和俄国,他们的主食基本上是以面食为主;另一方面,面粉加工业的兴建,促进了小麦的种植。

移民对呼伦贝尔土地的开发,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这一地区的面粉加工业和以粮食为原料的酿酒业。面粉加工业,据统计,到 1929 年 6 月,呼伦贝尔地区的机械制粉厂——火磨厂,规模较大的有 4 家。海拉尔 2 家、东额旗 1 家、牙克石 1 家。其中,海拉尔制粉厂,日产面粉 2550 袋;东额旗三河制粉厂日产面粉 800 袋;

牙克石制粉厂日产面粉 300 袋<sup>⑩</sup>酿酒业到 1926 年共有 3 家,先以马铃薯为主,后因价格过高,改为玉蜀黍和稷子造酒,主要在本地区销售。

呼伦贝尔地区以牧业为主,清末以前,虽然有少量的与牧业经济有关的皮革加工业,但都极为简单落后,多半是牲畜、皮货直接交易。民国时期移民进入呼伦贝尔地区后,近代加工业逐渐兴起。到 1926 年仅海拉尔、满洲里就有屠宰场 2 家、制肠厂 6 家、洗毛厂 5 家、牛乳制油厂 2 家、皮货靴鞋厂 12 家、制革厂 2 家、肥皂油脂厂 6 家<sup>⑪</sup>。

呼伦贝尔地区由于农业的开发,工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商业的繁荣。以海拉尔为例,民国初年山西人开办的商铺有鼎盛昌、丰盛隆 2 家,河北人开办的商铺有义立源 1 家,山东人开办的商铺有宝兴福、天合裕、洪顺成、福来号 4 家<sup>⑫</sup>。

民国初年,呼伦贝尔地区的国内移民不仅带来了农业和加工工业的先进技术,同时也带来了中原的先进文化,促进了文化交流与融合,使呼伦贝尔地区发生了重大变化。

国内移民所带来的中原文化,在呼伦贝尔地区少数民族中广为传播,并被当地民族所逐渐接受。如语言、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等,逐渐渗透到呼伦贝尔各地,在文化层面对呼伦贝尔地区的游牧民族进行了重新塑造。

文化的交流是双向互动的,我们既要承认汉族文化对呼伦贝尔游牧文化的影响,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呼伦贝尔游牧文化对汉族传统文化所产生的作用。呼伦贝尔地区游牧文化世代承袭,不可能因移民的到来而在短期内得到完全的改变,汉民族文化也不是简单的“复制”到呼伦贝尔地区。汉民族的传统文化由于脱离母体和环境的改变,也在发生异变。移植到呼伦贝尔地区的汉族文在改变呼伦贝尔地区面貌的同时,他们自己也程度不同地被打上了当地固有文化的烙印。

一个地域和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是该地区和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和民族性,这是历史传承所造成的。但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由于时代的变迁,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异族文化的渗入都会使之发生重大的变异。如饮食习惯上,蒙古族饮食原本以乳肉为主,但是随着关内移民的到来,粮食和蔬菜的种植,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习惯,饮食以乳、肉、米(稷子)为主,并兼用

其他粮豆、蔬菜。与农业区靠近的蒙古族,他们的饮食变化更大,“以五谷杂粮、蔬菜为主,乳肉为辅”<sup>⑧</sup>。迁居呼伦贝尔地区的国内汉族移民,受到当地民族的影响,他们“普遍喝奶茶”<sup>⑨</sup>,这一习俗与他们原本的饮食习惯完全不同。可见,国内移民在影响蒙古族的同时,也受到蒙古族的生活习惯和习俗的熏陶和感染,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

人类的生存,首先是对自然条件的利用,其次才是开发和改造。呼伦贝尔地区草原广阔,自然资源丰富,因此便成为游牧民族世代生息的家园。国内移民虽然带来了农耕文化,但并不能完全彻底地改变呼伦贝尔地区的游牧文化。因而,民国时期呼伦贝尔地区是关内移民和本地少数民族多种文化相互影响、融合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新型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移民不仅是文化的载体,而且也是文化的传播者和创造者。

## 注 释

①班固:《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中华书局,第3776页。

②程廷恒修、张宗璠纂:《呼伦贝尔志略·方輿沿革》,上海太平洋印刷公司,1933年版,第27页。

③屠奇撰:《黑龙江輿图说·呼伦贝尔图说》,李兴盛、马秀娟主编:《程德全守江奏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41页。

④章伯锋:《北洋军阀》第五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404—407页。

⑤邓拓著:《中国救荒史》,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页。

⑥张振之:《人祸天灾下之山东人民与其东北移民》,《新亚细亚》,第2卷第3期(1931),第37页。

⑦邓拓著:《中国救荒史》,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45页。

⑧王成敬:《东北移民问题》,《东方杂志》,第43卷第14号(1947),第13页。

⑨呼伦贝尔民族事务局编:《呼伦贝尔民族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65页。

⑩程廷恒修、张宗璠纂:《呼伦贝尔志略》,上海太平洋印刷公司,1933年版,第200页。

⑪邹尚友、朱枕薪:《呼伦贝尔概要》,东北文化社铅印本,1930年版,第23页。

⑫王成敬:《东北移民问题》,《东方杂志》,第43卷第14号(1947),第16页。

⑬乔平:《中国的移民殖边》,《清华月刊》,第42卷第6期(1934),第55页。

⑭吴希庸:《近代东北移民史略》,《东北集刊》,第2期,1941年版,第52页。

⑮海拉尔市史志编辑办公室编:《海拉尔市情》,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1页。

⑯[俄]阔尔马佐夫著、东省铁路经济调查局编:《呼伦贝尔》,东省铁路调查局,1929年版,第176页。

⑰[日]守田利远:《满洲地志》(中卷),株式会社東京築地活版製造所,1913年版,第561页。

⑱呼伦贝尔盟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呼伦贝尔盟志·经济综述》,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第739页。

⑲呼伦贝尔盟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呼伦贝尔盟志·经济综述》,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第740页。

⑳程廷恒修、张宗璠纂:《呼伦贝尔志略·户口》,上海太平洋印刷公司,1933年版,第197页。

㉑李德滨、石方:《黑龙江移民概要》,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2页。

㉒程廷恒修、张宗璠纂:《呼伦贝尔志略》,上海太平洋印刷公司,1933年版,第239页。

㉓[俄]阔尔马佐夫著、东省铁路经济调查局编:《呼伦贝尔》,东省铁路调查局,1929年版,第175—176页。

㉔[俄]阔尔马佐夫著、东省铁路经济调查局编:《呼伦贝尔》,东省铁路调查局,1929年版,第167—168页。

㉕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东北经济小丛书·农产(加工篇)》,京华印刷局,1948年版,第85页。

㉖[俄]阔尔马佐夫著、东省铁路经济调查局编:《呼伦贝尔》,东省铁路调查局,1929年版,第187页。

㉗[日]守田利远:《满洲地志》(中卷),株式会社東京築地活版製造所,1913年版,第561页。

㉘呼伦贝尔民族事务局编:《呼伦贝尔民族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2页。

㉙呼伦贝尔民族事务局编:《呼伦贝尔民族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66页。

责任编辑:文毅